

韓愈之文學創作觀

劉三富撰、邱榮鏘譯

民國七十一年五月

韓愈傳記

資料之四

韓愈文研究

精二冊 美金三十四元

發行人：朱

兼主編：朱

出版者：天

出版社 傳版社

社址：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六六號三樓

電話：三〇一二八七三

郵撥：一〇一二四

信箱：七二一九七

登記證：新聞局版台業字第〇〇五一號



劉臺中

日本西學大講師

歐陽修新唐書文藝傳序論唐代文學之嬗變，約如下列三階段。其言曰：

大難始來，清江左流風，純句繪章，撓合低仰，故王楊爲之伯。玄宗好經術，召臣稍厭雕琢，索理致崇雅黜浮，氣益雄渾，則燕許擅其宗。……唐貞元間，英才輩出，撓情道真，洞泳聖涯。於是韓愈出，柳子厚，李翱、皇甫湜等和之。排逐百家，法度森嚴，長吟音韻，上繼漢周。唐之文，完然爲一玉法，此其極也。

即初唐爲沿襲六朝餘風之熙文時期。自盛唐爲別文之衰微時期。
○中唐爲古文勃興與韓柳文風鼎盛時期。
宋姚鉉唐文粹序亦嘗論述唐代散文之梗概如次：

「有唐三百年，用文治天下，陳子昂起於唐蜀，始振風雅。」
詳是沈李嗣興，李杜傑出，三義四始，一變全道。洎張燕公

以輔相之才，專講述之任，雄秀逸氣，發動空懸。蘇軾云：「繼之以宏麗、不襲前格，而化蕭何以工雅之辭本述作；常楊以轍轍，首唱古文，退橫流於罔墮，歸正道於夷阻。於是柳子厚、李元寶、李翱、皇甫湜又從而和之……故論者以異之。」之文可繼楊孟、李得之矣。至於賈常侍至，李補闕鄭元容州結，獨孤常州及，呂衡州溫，吳補闕肅，樞文公德卿，劉賓客禹錫，白尚書昌黎，元江夏柳，晉文公鄧卿者歟！」

如上二家所論，唐代古文乃繼衆多作者之努力與研鍊，益以時之所趨，至韓愈一出，遂奠定繁圓之基石。

世之論韓愈，或以與柳子厚並稱，以爲並世古文運動鉅子。

惟宋祁則云：

「柳州爲文，或取前人陳詞而用之，不及韓吏部卓然千古，一皆出於己。」（宋祁文公筆記卷上）
蘇軾亦云：

「唐無文章，唯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。」
(舊後魚隱叢話卷十八引)



是宋、蘇皆獨推
韓文公而不兼及
柳子厚。東坡撰

潮州韓文公廟碑

乃直謂文公「文
起八代之衰、道
濟天下之溺。」

其推崇至此。

成此新文體者，即曠代文豪之韓愈。
下文謹就韓愈之文學創作觀，略抒管見。

二、

韓愈自敍其幼年云：「天祐我家、百殃降集」（祭鄭夫人文、集卷五）又云：「愈生三歲而孤，隨伯兄會徙官嶺南。」又云：「嗚呼！吾少孤，及長，無所省怙，惟兄嫂是依，中年兄沒南
方，吾與汝俱幼，從嫂歸葬河陽，既又與汝就食江南，零丁孤苦，未嘗一日相離。」（祭十二郎文）據此則愈三歲而父（仲卿）卒，後依其兄會夫婦養育成人。會後坐宰相元載事罪，以起居舍人之官被貶韶州（今廣東省境內），建中二年（七八一）卒於其所，時愈方十二歲，適逢安史亂後，戰亂猶未平息。如此境遇之中，蓋已備嚙孤苦困窮也。

韓愈幼既備極困苦流離，益以其伯父雲卿、兄會均會祇閑天

為軍閥，不遵守中央所命之責。一為宦官……安亂後，此二勢力與朝廷間，或兩勢力之間，或諸勢力間，互鬭不止，始終為唐
代政治之癥結所在。」（見清著《唐宋八家文上》頁三一四）

蓋安亂以前唐代政治體制，或尚沿南北朝以降以皇族為中心之封
新體。此乃一反形式拘限甚嚴之「群體」，而重視個人思想意志
之自由表現之「散體」。其於中唐以後之文學，影響甚鉅。而完

三十歲於江陵「上兵部李侍郎書」亦云：「性本好文學，因困
階級之抬頭；社會經濟亦隨之產生一新局面。至於文學，則南北
朝以來四六群體文體，亦為之一變，代之而起，則為「古文」之
新體。此乃一反形式拘限甚嚴之「群體」，而重視個人思想意志
之自由表現之「散體」。其於中唐以後之文學，影響甚鉅。而完

「值中原用事，宜就食江南，始專於講習，其古訓無所用其心，覓前靈之逸迹，超孤舉以幽尋；既識途而疾驅，孰知余力之弗任。」（卷二）可知自幼已爲復興儒學與文章，寄情肆力，立志既定，用功甚勤。

韓愈如何提倡古文？愚以爲氏始終以道與文爲相輔相成。吾人欲明道與文之關係，必先知其所謂「道」，究何所指？「原道篇」云：

「斯吾所謂道也，非向所謂老佛之道也。堯以是傳之舜，舜以是傳之禹，禹以是傳之湯，湯以是傳之武周公，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，孔子以是傳之孟柯，柯死矣不得其傳，荀與揚擇之而不精，語焉而不詳。」（卷一）

此文雖詳作於同年，惟氏所提倡之道，即自堯舜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儒家之道，則可知矣。

「重答張籍書」亦嘗說明其道。此書作於貞元十一年（七九五）時愈與張籍相識未幾，有感於當時世亂、聖道見棄而寄書云：

「前書謂吾與人商論，不能下氣，若好勝者然。雖誠有之，抑非好已勝也，好己之道勝也，己之道乃夫子孟柯揚雄所傳之道也。若不勝則無以爲道，吾豈敢避是名哉？」（卷二）

山是觀之，氏所倡之「古文運動」，乃以復興「古道」爲目的。

蓋欲學古文辭當以「古道」爲門徑，且文與道非結合爲一事不可。惟文而無道，則所爲文失其目的；惟道而無文，則道無以實踐。其弟子李漢《昌黎先生集序》曰：「文者貫道之器也，斯以道深而至焉者無有」即所以傳述其師以文與道相輔相成之意也。（譜注一）

韓愈爲貫徹此說，乃主張非讀古書、識古字不可。蓋不如是，則無以通古之道。雖然，此所謂重視「道」，非謂彼不重視「文」。故其言曰：

「夫所謂文者，必有諸其中。是故君子慎其實，實之美惡，其發也不揜。本深而末茂，形大而聲宏，行峻而言厲，心醇而氣和；昭晰者無疑，優游者有餘。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，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。」（卷二「答尉遲生書」）

按此所謂「實」即指「古之道」。人之內而有心，外而有身。文之內爲「實」，外則爲「辭」。二者莫不與修道有關，其所重雖在此，惟修道一事尚不足以爲文，必能適切之「辭」，以表現所欲言之「道」，然後始可謂之文也。

然則宣揚「古之道」，是否宜用「古之辭」？是亦不然。韓愈「答劉正夫書」云：

「或問爲文宜何師？必謹對曰：宜師古聖賢人。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，辭皆不同，宜何師？必謹對曰：師其意，不師其辭。又問曰：文宜易宜難？必謹對曰：無難易，惟其是爾。」

此明其古文，僅師古之道，而非師其辭。且所謂古文者，必出於一己胸臆之創作。韓愈爲其友人樊宗師所撰墓誌銘云：

「然必出於己，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，又何其難也。必出入仁義，其富若生蓄萬物，必具海含地負，放恣橫從，無所統紀，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。……銘曰：惟古於詞必出自己，降而不能乃剽賊。後哲指前公相襲，從漢迄今用一律。參順久哉莫覺屬，神徂聖伏道絕寒。既極乃通發紹述，文從字順各識職。有欲求之此其躅。」（卷七「南陽樊紹述墓誌銘」）

此文固是稱讚樊紹述一位並世作者。（譯注二）然亦實韓愈一

貫之文論。韓文過人之處，在於揮灑自如而仁義之道自存於字裏行間。氏以爲古之聖賢，皆依己意，以彼等之言辭創爲文章。是故今人創爲文章，亦當僅依古人之意，而以今人之言辭表達之。不得既用古人之意，又襲古人之辭。此即所謂「師其意，不師其辭」。此一時代油然而生之文章，自不當隸屬於古代文辭之流派。韓愈所以主張「文必出己」意即在此。氏於「答李翊書」更暢述爲父之態度云：

「愈之所爲，不自知其至猶未也。雖然，學之二十餘年矣。始者，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，非聖人之志不敢存。處若亡，行若遺，儼乎其若思，莊乎其若迷。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

也，惟陳言之務去，戛戛乎其難哉！其觀於人也，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。如是者亦有年，猶不改，然後識古書之正僞

，與雖正而不至焉者，昭昭然自黑分矣。而務去之，乃徐有得也。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，汨汨然來矣！其觀於人，笑之則以爲喜，譽之則以爲憂，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。如是者亦有年，然後浩乎其沛然矣。吾又懼其雜也，迎而距之，平心而察之，其皆醇也，然後肆焉。雖然，不可以不養也，行之乎仁義之途，游之乎詩書之源，無迷其途，無絕其源，終吾身而已矣。氣、水也，言、浮物也，水大而物之浮者大，小畢浮，氣之與言猶是也；氣盛則言之短長，與聲之高下者皆宜。」（卷三）

以上可謂文學家創作應有態度之具體說明。特以水喻氣，以浮物喻言，氣與言之關係，猶水與浮於水上之物者然，以故，文者當以氣爲主，氣之所至，不爲任何約束而暢所欲言。韓愈此論，於骈偶文風未革除之當時，致其積極之改革作用。吾人細繹此書，殆愈爲學爲文之自白：層次漸進，始則有感「戛戛乎其難」，繼則文思「汨汨然來」；終則「浩乎其沛然矣」。凡歷三階段，而廿二年餘年之努力，始成其新創之古文。不僅此也，其文之工夫所以臻於純達，亦可由此數語見之。蓋文章之工夫所以能精熟，端賴不間斷的努力。韓愈得其三昧，故曰：

「堯舜禹湯治天下，羲和治射，庖丁治牛，師曠治音聲，扁

鵠治病，僚之於丸、秋之於奕、伯倫之於酒、樂之終身不厭，奚暇外慕。夫外慕徒羨者，皆不造其堂，不齊其斂者也。

一（卷四「送高閑上人序」）

斯亦長久致力於古文，體驗所得之金科玉律。正以其「樂之終身不厭」方能「造其堂」「疇其誠」。此一精深之經驗談，在其倡導古文之當時而言，影響甚鉅，自不待言；即後人欲探古文義法者，亦多有取資於是。故吾人今日評論韓愈文，自應推重其文章之技巧與內容之價值。

「韓文義法之發明，要言之有三：「惟陳言之務去」，宜以今之辭爲文，此其一。「文從字順各識職」（見上引南陽樊紹述墓誌銘）務求達詞造句之正確而流暢，此其二。「因事陳詞」、「辭事相稱」（進撰平淮西碑文表）「文章言語與事相應」（上襄陽子相公書），文章與事理相表裏，即文與道合一，此其三。

韓愈所以主張爲配合時代之思想，宜創「新辭」、及逍遙用字、宜力求正確而自然，是皆因時代趨勢應運而生之論。進一步送孟東野序中所提出「不平則鳴」之文學主張，可視爲其「古文運動」中欲擔負現實社會批判之理論根據。此庶云：

「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。草木之無聲，風撓之則鳴；水之無聲，風蕩之則鳴。其躍也或激之，其沸也或炙之。金石之無聲，或擊之鳴，人之於言也亦然，有不得已。

者而后言，其譯也有思，其哭也有懷，凡出乎口而爲聲者，其皆有弗平者乎！……其於人也亦然，人聲之精者爲言，文辭之於言也，又其精也。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；變弗能以文辭鳴，又自假於韻，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，伊尹鳴股、周

公鳴周，凡載於詩書六藝，皆鳴之善者也。」（卷四）

蓋物之狀態，不得其平衡，則必動搖，動搖則生音。韓愈由此探求文學產生之主因。以爲人之言語亦然。精神平衡狀態時，無所謂言語。有不得不言之動機，然後始發而爲言。當其胸中有所思所感，則或唱或哭，一咷一嗟，聲音之發，即象其精神之未得平衡矣。

此序雖爲友人孟郊之赴任江南溧陽尉而作，然所謂「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」，莫非亦作者胸中長年蘊藏之感。換言之，或以孟郊遠去京師任區區溧陽尉爲契機，而觸發其文學創作之動機，將其長年爲古文運動而遭遇之不平之情，播精盡思以自鳴歟？要之，愈以爲文學乃精神失去安定始有創作之可能。序中復舉古之哲人文宗，皆爲不平而自鳴一代。彼等之創作動機亦皆由憤懣不平於心之故。然則韓愈之創作論，可謂之「不平之創作觀」也。

三、

上述韓愈少困苦，兄弟，無以繼日。以家貧故，欲入仕途，以維生活。德宗貞元二年（七八六），年十九，赴長安。貞元八年

年遂及進士第。惟其後應禮部博學宏詞試，三度落第，仕宦途絕。二十八歲乃三上宰相書以自薦。書中所述不遇之感，意謂宰相賢於周公，然周公虛心求賢，今宰相則不能盡舉天下之賢才。故云：「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？蓋邪謠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？」惟愈上書後，終未見用。故居長安約十年，悒悒不得志。此於愈之一生及其文學觀之影響，不可謂不鉅。此其間，彼無一日不因貧踴而戚戚然，亦無一日不爲富貴而汲汲然。所以汲汲然者，蓋一心爲天下憂，而必欲一出，不欲自安於隱遁艸莽之間，非僅爲己之利也。其「答崔立之書」云：

「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，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，養窮孤；其

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。」（卷三）

韓愈既不得見知於當國者，因撰「應科目試時與人書」，自比爲「天池之濱，大江之瀆」，窮困不能自致」之怪物。「雜說」中，則自喻爲不得遇伯樂之千里馬。復於「獲麟解」中，託辭不得舉人而出之麟，被目爲不祥之物。凡此皆怨訴己才之不見用於當時也。

惟愈之所以發此怨憤之言，蓋有難言之衷。原來，文人之一

其通性：大氏孤高自負，然愈之此「不平之鳴」，會反訴諸執

政、毫不忌諱，殆非一般孤高之文人可同日而語。關於此節，近人陳登原氏曾論評之，以爲大惑不解（原注二）。惟愚見則以爲此乃韓愈自訴不遇之感，以及不輕易仿效古人文辭，但師其意，而自創新辭，因而不爲當世所共許之雙重「不平」之真相。

韓愈不特於文學創作主「不平則鳴」之理論。甚且於書畫，亦主「不平」之說。氏於「送高閑上人序」云：

「往時張旭善草書，不治他伎。喜怒窘辱，憂愁愉快，怨恨

思慕，酣醉無聊不平，有動於心，必於草書焉發之。」

又云：「爲旭有道，利害必明，無遺鎔銖，情炎於中，利欲鬪湧

，有得有喪，勃然不釋，然後一決於書，而後旭可幾也。」

（卷四）

其意蓋書家亦必深入現世人生之中，經歷甘辛，考其得失利害，堅苦奮鬥，不屈不撓，而後感著於心，書形於外。要非遠世避隱而可幾也。是則書家亦如文學家，固宜於現世中「感苦」「不平」，而後鳴家。氏於「荊潭唱和詩序」更述不平與感苦之旨云：

「夫和平之音淡薄，而愁思之聲要妙，讒諛之辭難工，而窮

苦之言易好也。是故文章之作，恆發於羈旅草野，王公貴人

，氣滿志得，非性能而好之，則不暇以爲。」（卷四）

按此語似亦爲當世不容，悒憤而發之感。故「發於羈旅草野」之聲，恆爲「愁思要妙」，亦可謂韓愈爲文、論文之「基本觀念」。易言之，氏所謂古文、非貴在仿古之「經典主義」，而在於形式與內容皆求臻於創作境界之「經驗主義」。亦即非三代兩漢文章之模倣，而欲出於己思想之創作也。

考昌黎集所收文章，種類固繁，然即墓誌銘、序、表、祭文等較偏重形式應酬之作，亦因出於高手，而風格獨具，不同凡響。復有溢出一般文體之雜著，雜文，然而就其發端言，古之文多爲實用之書記文字。禮記玉藻云：「左史記言，右史記事」。雖未敢遽信，惟取古今文獻覩之，則三代兩漢之「古文」，以內容分，亦可概區爲「記言」與「記事」二類。迨後，魏晉迄於唐韓愈以前賦文，幾近範圍士人文人之思惟。此即東坡翁所謂「八代之衰」歟？韓愈起而將古文用於多方而之記實，可謂在惟美文學之風潮下，回復古文原有之記論作用，重建古文之實用性。東坡

謂其「文起八代之衰」，可謂高論。

吾人今觀昌黎集雜著、雜文之中，有「爭臣論」「師說」「原道」諸篇，義正辭嚴者；有「雜說」「鴟解」「毛穎傳」諸篇，寓意深遠者；有「堯者王承福傳」等為凡夫立傳者；有「伯夷頌」等，論贊古賢人者；有「畫記」等，題識風物者；有一讀荀「讀墨子」等研讀書後者。或長或短，或為雄壯，或出諸謳，殆皆文因事異，各具佳趣。其立意造辭雋永，筆法繁采未可一類。而文思自由，渾浩流轉，變化萬千。

上述韓愈之古文章法旨趣，吾人若強為之考源，則可上溯於諸子、史記、漢書。惟文章之風貌則別具一格，不與古人同。彼蓋將古文之用擴而大之，演繹為多種形式。此亦韓愈之功猷。若問古文如何擴大運用？則因事而異，所謂「因事陳詞」「師聖人之意，傳古聖賢之道」；且必深入社會，「考其利害得失」「不平則鳴」。如是頑抗社會及當時文風之頗弊，面對現實，倡導文學改革，亦即所以擴大古文之用者也。

前云韓愈力斥楊學老莊、佛教異端之思想，而一以復興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脈相承、先王之道為其職志。氏之所以如是貫徹主張者，即欲挽當時社會之狂瀾，導之使一歸於孔孟正統儒家思想體系之故。氏於「原道」一文，堂堂揭橥此一理想，而斥老莊，謂其使民「窮且盜」（譯注三），「論佛骨表」則旨在表露其尊孔孟而斥佛之真意。此等言論，皆與當時社會背景相為因果，息息相關。考齊治通鑑元和十三年八月至十一月條下載、唐憲宗為汲汲於求一己之永生，恣意訪求諸方士。十二月條下載、憲宗遣英奇之士往鳳翔迎佛骨及僧衆，留禁中三日，乃送至佛祠。士人為之顛倒膜拜。韓愈目睹此事，惑亂民衆，斂財敗俗，因奉表上聞。關於此篇，日人太田次男於「韓愈之一考察」文中，剖論之曰

：「就此一意義而言，則愈此表可謂空前之激烈反佛意識。……亦且言於所當言之時，濟世匡俗之論。韓愈之古文，肇端於儒教，由原道、平淮西碑文，逐漸推進，而至論佛骨表，乃極盡其宗儒反佛之能。而此表之作，思想境界既已臻於精熟，古文筆法亦登峯造極矣。」（原注三）太田氏此語蓋得韓愈「不平鳴」文學創作觀之真諦。

綜上所述約而言之，韓愈之古文所以昂然獨造千載宗仰者，其故約有三端：（一）就其思想內容而言，歸本於儒家之道。（二）就其文學創作觀而言，始終貫徹其反映現實社會、「不平則鳴」之態度。（三）就其章法及遣詞造句而言，則悉主創作，不依倣古人陳詞。由斯三端，以抗拒六朝餘風、振興古文，故能起衰於一代而嘵然獨鳴歟！（本文譯自西南學院大學文理論叢第十五卷第一號）

〔原注〕（一）本稿引文據馬其昶《韓昌黎文集校注》

〔二〕參見陳登原氏「韓愈評」（金陵學報二卷二期）

〔三〕參見太田次男氏「韓愈之一考察」以官宦生活為中心（斯道文庫論集第一輯、頁一七七）

〔譯注〕（一）近人夏敬觀「說韓」云：「李漢序其集云：文者貴道之器也。……李漢劉向云所稱蓋本於退之平昔自道之旨，與四士詩所言相合。」

〔二〕樊宗師字紹述、唐書經籍志著錄樊宗師集二百九十一卷。李肇國史補云：元和之後，文筆則學奇於韓愈，學澀於樊宗師。

〔三〕譯有按原道「奈何民不窮且盜也」一語乃兼老佛言而不及莊。

〔四〕本文全依劉氏原作譯出，惟論韓文則偶有以意增補，但為行文之便耳。又劉文「黃雲眉氏云」一段無關宏旨，不予譯出。

朱子論韓愈文之氣勢

楊
勇

- 一 導言
- 二 文勢開闊例
- 三 文勢抑揚例
- 四 語勢自然例
- 五 字句倒逆例
- 六 文勢緩急例
- 七 語勢盡殺例
- 八 語勢微舛例
- 九 語勢相協例
- 一〇 文章整潔語勢通暢例
- 一一 文章之朗誦

一 道言

韓昌黎集，唐李漢撰者四十卷，七百篇，（註一）後來續爲之集者，又有外集十卷，並遺詩、遺文之屬合六十餘篇，（註二）今傳魏仲舉五百家註韓集、廖莹中世綱堂本韓集俱見，大氏韓文之美，已盡於是矣。自唐倡古文，迄於南宋，天下文章，多摹昌黎，學士相承，洛陽紙貴，傳鈔既久，譌誤疊增，乃有不可卒讀者。淳熙間莆田方氏崧卿知兵台州，據碑本十十七，諸家書九，撰韓集舉正十卷，外集舉正一卷，意欲次其異同，考其得失，而矯其譌誤者；然崧卿識淺，不能克其功。慶元丁巳，朱子乃奮然因方氏之書，更爲校定，撰韓文考異（下簡稱考異）十卷，序曰：

南安韓文，出莆田方氏，近世號爲佳本，予讀之信然；然猶恨其不盡載諸本同異，而多折衷於三本也。原三本之見信，杭、蜀以舊，閩以官，其信之也則宜。然如歐陽公之言：韓文印本，初未必誤，多爲校讎者妄改，亦謂如羅池碑改「步」爲「涉」，田氏廟改「天明」爲「王明」之類耳。觀其自言，爲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氏，計其歲月當在天禧中年，且其書已故弊脫畧，則其摹印之日，與祥符杭本，蓋未知其孰先孰後？而嘉祐蜀本，又其子孫明矣！然而猶曰：三十年間，聞人有善本者，必求而改正之；則固未嘗必以舊本爲是而悉從之也。至於祕閣官書，則亦民間所獻，掌故令史所鈔，而一時館職所校耳；其所傳者，豈真作者之手稿，而是正之者，豈盡劉向、楊雄之倫哉！讀者正當擇其文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，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爲重輕也。抑韓子之爲文，雖以力去穢言爲務，而又必以文從字順，名識其職爲貴。讀者或未得此權度，則其文理意義，正自有未易言者。是以予早此書，姑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，以待覽者之自擇。區區妄意，雖或苟有所疑，而不敢偏有所廢也。

又韓集前考異曰：

此集今世本多不同，惟近歲南安所刊方氏校定本號稱精善，別有正舉十卷；論其所以取取之意，又它本之所無也。然

其去取，多以祥符杭本、嘉祐蜀本及李、謝所據館閣本爲是，而尤尊館閣本。雖有謬誤，往往曲從；它本雖善，亦棄不錄。至於舉正，則又例多而詞寡。覽者或頗不能曉知，故今輒因其書，更爲校定。悉考衆本之同異，而一以文勢義理及它書之可證驗者決之。苟是矣，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；有所未安，則雖官本、古本、石本不敢信。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，以爲考異十卷，庶幾去取之未善者，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。

又朱子文集卷八十三跋方季申所校韓文云：

余自少喜讀韓文，常病世無善本，每欲精校一通以廣流布，而未暇也。今觀方季申此本，讎正精密，辨訂詳博，其用力勤矣。但舉正之篇所立四例，頗有自相矛盾者；又不盡著諸本異同，爲未盡善。此等書，前人爲之已有成例；若大書本文於上，而用顏監漢書法悉注衆本同異於其下，因考其是非，以見定從今本之意。則讀者有以曉然知衆本之得失，而益信吾書之取舍不誣矣。萬一考訂或有未盡，取舍不無小差，亦得尙存他本別字，不遂泯滅，以待後之君子，尤久遠之慮也。

然則朱子成書始末，既其旨趣體例，於此可見大畧矣。自是以後，韓書復歸於正，世之爲韓文者，亦皆以朱子爲定焉。

朱子以理盛名，而文章之淵懿闡通，後世不能掩其實，炳然天下，百代從風。幼年喜讀韓文，嘗曰：「余自少喜讀韓文」，語類八記「朱子喜讀韓文燕喜亭記及韓弘碑」，文集八十三跋方季申所校韓文又云：

季申所謂謝本，則紹興甲戌乙亥之間，余官溫陵，謝公弟如晦之子景英爲舶司屬官，曾於其几間見之。蓋用天台印本，剪粘綴附，依陳后山本別爲次序，而卷首歎以建炎奉使之印。因讀其送陳彥秀才序一篇，則「何不信之有」句內，輒用丹筆去「不」字。初甚駁之，用加尋繹，乃知必去此字，然後一篇首尾始復貫通。蓋傳襲之誤久矣。讀者雖亦微覺其礙，而未暇久究也。常窺識之，以驗他本，皆不其然。此本雖精，亦復不見；豈季申讀時便文縱口，尙不免小有遺脫，將所見者非其真本先傳，校者已失此字也邪？（註三）

知朱子用力韓文，初見謝本，乃在紹興甲戌乙亥之間，年二十五六歲，下迄慶元丁巳六十八撰考異，其發心積慮爲書，已四

十有二年矣。又朱子父韋齋亦好詩文，深通文理，韋齋集卷九十謝參政書曰：

取六經諸史，與夫近世宗公大儒之文，反覆研取，盡為人事，夜以繼日者二十年。其於古今文章關鍵之開闢，淵源之

停滯，波瀾之變遷，固已得其一二。

朱子對於文學之造詣，不唯愛好有自，亦蒙家學之薰陶。若論其成學造述，根本大能，亦與其熟精文理有莫大之關係。故凡古經之辨僞，典藉之校勘，無不先識文章之製度。韓文之校訂，尤能顯其學問之博大精深；一字之得失，篇章之關鍵，必究其行文之所當然。則朱子之撰考異，學養意境，已極老到矣。余讀朱子此書，最喜其文勢文理之說，繁縝俯仰，有不能自己者；此正常人所不易言，而朱子則詳言之；亦余心之所欲言，而朱子已先具之。百喜之餘，因輯成篇，以爲韓文相印證。庶幾韓公之德永彰，朱子之業不替。首布文勢，以饗同好者焉。

韓愈文章最大之特色爲氣盛，韓愈論作文之道亦主張此。答李翊書曰：「氣，水色；言，浮物也。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。氣之與言猶是也。氣盛，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。」張圓墓碣銘曰：「文辭有氣。」故當時之人，蔚然向風，古文運動底成。朱子論韓愈之文氣，似又較韓公進步落實，考異中所舉，多以勢字狀之，而鮮有用氣字者，殆氣字爲一通名，空洞無實，不可捉摸耳。而勢字爲狀詞，所狀者多以氣字爲主，是以勢字之中已含有氣字之義，言文勢者，又必以生氣靈氣以爲象，而非以死氣暮氣以爲形也。抑考異中所述文勢語勢者，又多在韓愈文章之技巧上言，則如何達勢而使文章生氣橫溢，或如何語勢相協而使脉絡貫通也。

二 文勢開闢例

考異卷一南山詩「衆鱉」格曰：

方從蜀人韓仲韜本作「穀」，云：石幕也。一謂皆取喻謂之高而羣峯聳峙，如廬廟之奇；低而堆阜分布，如金城之列。

。於義爲近也。

今按：此蜀本之誤，沈元用本亦然，皆非是。蓋此但言登山之時，叢薄蔽翳，方與蟲獸羣行；而忽至山頂，則豁然見前山之低，雖有高陵深谷，但如皺物微有蹙摺之文耳。此最爲善形容者，非登高臨曠野，不知此語之爲功也。况此句「衆皺」爲下文「諸或」之綱領，而「諸或」乃「衆皺」之條目，其語意接連，文勢開闊，有不可以毫釐差者。若多方說，則不唯失其統紀，亂其行列，而鼯鼃動物，山體常靜，絕無相似之理。石墓之與堆阜，雖畧相似，然自高頂下視，猶若成堆，則亦不爲甚小而未足見南山之極高矣。其與下文「諸或」疎密工拙，又有迥然不侔者。未論古人，但使今時舉子稍能布置者，已不爲此；又况韓子文氣筆力之盛，關鍵紀律之嚴乎？大氐今人於公之文，不知其文從字順之爲貴，故其好怪失常，類多如此。今既定從諸本，而復備論其說，以曉觀者云。

韓集卷一 南山詩曰

吾聞京城南，茲維羣山頭；東西兩際海，巨細難悉究。山經及地志，茫昧外受授；團辭試提絜，挂一念萬漏。欲休諒不能，粗敘所經覩；當昇崇丘望，戢戢見相湊。晴明出稜角，縷脉碎分繡；蒸嵐相湧洞，表裏忽通透。無風自飄簸，融液煦柔茂；橫雲時平凝，點點露數岫。天空浮脩眉，濃綠畫新就。孤桺有巉絕，海浴峩鵬喝。春陽潛沮洳，……夏炎百木盛，……秋霜喜刻綴，……冬行雖幽墨。……西南雄太白，突起莫閒簪，……昆明大池北，去觀偶晴畫，繇聯窮俯視，倒側圓清漚，……崎嶇上軒昂，始得觀覽富；行行將遂窮，嶺陸煩互走；……專心憶平道，脫險途避臭。昨來逢清露，宿願忻始副；崕嶽躋景頂，倏閃難鼯鼬。前低剗開闊，爛漫惟衆皺。或連若相從，或蹙若相鬪，或安若弭伏，或竦若驚確，……延延離又屬，夬夬返還邁，喟喟魚闖萍，落落月經宿。……大哉立天地，經紀肖營腠。……」

南山詩，百二韻，累千言，古來詩人，鮮有此製。使狂奔直鴻，一氣呵成，則迂迴曲折，蜿蜒之狀不可見；若細針密縷，叮之啄之，則頹唐之勢又難免。必以文爲詩，廣而開其貌，峻而急其容，雖然隆物，而精光依然。朱子云：「此句衆皺，爲下文諸或之綱領，而諸或乃衆皺之條目，其語意接連，文勢開闊，有不可以毫釐者。」實導破韓文運氣定勢之奧祕。蓋此「衆

鍛」者，乃全篇之統制，開闔之扭樞也。古文家命脈之所寄，韓公所以文起八代之衰者亦在此。洪興祖曰：「此詩似上林，子虛賦，才力小者不可到也。」亦以此故也。

三 文勢抑揚例

考異卷一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「我歌今與君殊科」條曰：

杭本如此。言張之歌詞酸苦，而已直歸之於命，蓋反騷之意。而其詞氣抑揚頓挫，正一篇轉換用力處也。方從諸本「我」下去「歌」字，而「君」下著「豈」字，全失詩意，使一篇首尾不相連押，無復精神；又不著杭本之異，豈考之亦未詳耶。

韓集卷三本詩曰：

同時輩流多十道，天路幽險難追攀；君歌且休聽我歌，我歌今與君殊科。

前條「衆鍛」，朱子謂爲全篇統制之所在，乃從立體言，猶門庭之有開闔，其運轉生動，全由此樞而啓也。此謂抑揚頓挫，乃從平面言，詞氣之有波瀾起伏，可於上下兩句相連之際，重出相同之字，如張功曹詩之「我歌」是也；然「我歌」亦一篇轉換用力處。若如方說，則抑揚之勢不可見矣。

四 語勢自然例

著異卷二此日足用借鑑張籍「牛羊下田」條曰：
方作「茫茫平」，云「用古韻」。

今按：此詩固用古韻，然皆因其語勢之自然，未嘗作意捨此而用彼也。諸本只作「陂澤平茫茫」，韻諧語協，本無不可。若作「陂澤茫茫平」，却覺不響，不應以欲用古韻之故，牽挽而強就之也。又按：別本「平」或作「路」，而或作「何」者，語意尤勝，讀者詳之。

又卷二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驛塗中見寄「勞苦」條曰：

方作「苦勞」，云：「苦勞」，語見呂強傳。

今按：語勢當作「勞苦」，大抵公詩多自胸襟流出，未必故用古人語也。

又卷二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徵赤牋杖歌「照手欲把」條曰：

照手欲把，諸本同。方獨從蜀本作「照把手」云：「檀弓有手弓，列子有手劍，史記有手旗，義同此。諸本多誤。

今按：方說手義，固爲有據，然諸本云：「照手欲把」，則是未把之時，光已照手，故欲把而疑之也。今云「照把」，則是已把之矣，又欲手之而復疑之何耶？况公之詩，衝口而出，自然奇偉，豈必崎嶇偏仄，假此一字，而后爲工乎？大氐方意專主奇灑，故其所取多類此。

韓集卷二張籍詩曰：「東西出陳許，陂澤平茫茫。」卷四酬裴詩曰：「孤生屢窮辰，多才自勞苦。」朱子以「平茫茫」及「勞苦」，皆用字平易自然，不尚作做，則文勢暢達，不覺遲滯。東坡答謝民師書曰：「詩文如行雲流水，初無定質，但常行於所當行，常止於不可不止，文理自然，姿態橫生。」太氏古文家作文，皆主自然，肆筆脫口，文自胸中流出，勿強堆砌，無一毫生氣也。此非德盛仁熟不能至。又古詩第五字用響字，往往語勢雄壯，氣概豪偉，此亦朱子字響之意。卷四和虞部赤牋杖歌曰：「歸來捧贈同舍子，浮光照手欲把疑。」方爲「欲手」之「手」字覓證，是矣；而不知其證之不可從。朱子謂「照手欲把」，則是未把之時，光已照手，故欲把而疑之也。蓋其細辨文理意義，不煩旁證，而是非乃定。且「浮光照手欲把疑」，視諸方說，語勢又自暢順矣。